

政治发展与治理研究系列丛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政党 防范执政风险研究

崔桂田 著

**Makesizhuyi Zhengdang
Fangfan Zhizheng Fengxian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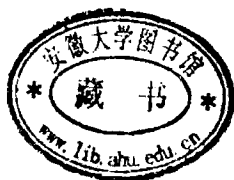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KS032)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06JDB003)

马克思主义政党 防范执政风险研究

崔桂田 等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研究/崔桂田等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607-4714-9

I. ①马…

II. ①崔…

III.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20616 号

责任编辑:谭学秋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3 印张 374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2011年是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作为中国近代第二所官办大学——“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的积累之悠久，底蕴之深厚，堪可感慨系之。

晚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呈朝廷并由光绪帝御批的《山东大学堂章程》中，就山东大学堂的办学宗旨做了这样的阐述：

**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
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

在20世纪初叶，在东渐之西学纷至沓来的近代中国，袁氏奏呈的“办学章程”却有着某种意义上的传承性与超越性。愚以为，袁氏立意“天下”、“国家”，绝非其偶然心念一动，在这一理念的背后，当是数千年孔孟儒学传统文化精粹的蕴聚与支撑。从而，为了“天下”、“国家”，而非“一己”之“进取”的办学理念，在那个中华羸弱、列强环伺的年代，越发彰显着山东大学的历史使命与民族责任，成为山东大学立足与发展的价值基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山东大学在伴随着时代动荡、社会变迁的百余年行进途中，尚能安然把握着方向与节奏，使之得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均能汇聚时代的学术精英，渐次积淀了丰厚的学术内涵和大学文化底蕴。迄今，亦能风雨无阻，依然跻身于全国高校第一方阵的前排。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是山东大学百余年行程过半的时候才得以组建的，如今业已年过而立。作为全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在山东区域的一方重镇，其或发展或进步或逡巡或蹒跚，总会令人瞩目，引人关注。作为山东大学不可割舍的肌体，政管学院之举手投足、一笑一颦，往往事关全校的布局与发展，甚或波及百年山大之盛誉。于是兹事体大，吾侪

2 马克思主义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研究

不敏,遂以《论语·泰伯》之教训为警醒:“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此,于2009年即谋划聚合全院教师,协同努力,做一学术振兴。列为其重要举措之一,即出版学术著作若干,自成体系,冠名曰“政治发展与治理研究系列丛书”,为的是既能涵盖学院诸多学科,又能与主体方向不离不弃——为了推动山东大学政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而积累学术内涵;同时,也是为了在这样的操练过程中,不断推出青年才俊。在学院团队整体发展的同时,教师个人也能加快进步与成熟,实现个体与整体的同步迈进。

我们肩负着学界前辈的成就与希冀,我们延续着百年山大的底蕴和盛誉。在当下学术与世俗混而难分、盛名与实学真伪莫辨的“转型时代”,我们当以山大人的真诚与辛劳,为学界奉上这组系列文字,为的是弘扬学术,以文会友。抑或移风易俗,振兴我山东大学之政治学学科。

是为序。

葛荃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2012年12月17日 重识于巢舍

目 录

导 论	(1)
一、防范执政风险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课题	(2)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的新趋向	(8)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的意义和内容	(20)
第一章 理论建设与创新：防范执政风险的思想武器	(25)
一、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和防范风险的先导	(25)
二、创新马克思主义以增强执政党的理论说服力	(27)
三、创新特色社会主义以增强执政党的事业吸引力	(31)
第二章 经济建设与发展：防范执政风险的物质基础	(40)
一、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41)
二、经济增长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带有生存性的问题”	(42)
三、经济改革是决定社会主义和执政党命运的一招	(47)
四、经济建设和改革要突出重点和整体配套	(51)
第三章 民主化与法治化：防范执政风险的政治保障	(75)
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党	(76)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政治风险及问题	(77)

2 马克思主义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研究

三、加快推进政治制度建设与创新进程·····	(83)
四、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建设的力度·····	(96)
第四章 文化建设与繁荣:防范执政风险的“软实力” ·····	(107)
一、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工作重心”·····	(108)
二、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先进文化·····	(110)
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115)
四、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19)
五、防止有害文化侵蚀和抵制“自由化”思潮·····	(122)
第五章 社会公平与正义:防范执政风险的合法性基础 ·····	(126)
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社会公平问题及风险·····	(127)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社会公平的理论认识·····	(136)
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处理社会公平问题的政策导向·····	(144)
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处理社会公平问题的新举措·····	(150)
第六章 民族团结与和谐:防范执政风险的国家认同 ·····	(172)
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民族问题及风险·····	(172)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解决民族问题的认识·····	(180)
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措施·····	(186)
第七章 宗教信仰自由与引导:防范执政风险的“心”的力量 ·····	(201)
一、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信仰状况·····	(201)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宗教问题及风险·····	(206)
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观点·····	(209)
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措施·····	(215)
第八章 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化解:防范执政风险的危机管理机制 ·····	(226)
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群体性事件与公共危机·····	(226)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处理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危机的政策措施·····	(232)

第九章 外交与安全:防范执政风险的国际环境	(239)
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国际环境及风险	(239)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外交政策调整的进程	(247)
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外交政策调整的重点	(257)
第十章 党的建设与变革:防范执政风险的内在动力	(281)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建设得“自身不出事”	(281)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286)
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自身建设的新认知	(290)
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与变革的主要举措	(294)
结 语.....	(332)
主要参考文献.....	(341)
后 记.....	(355)

导 论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史上,尽管防范执政风险从世界上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之日起就实际地提了出来,列宁为此也做了不少探索,但当时防范执政风险的任务是与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命运连在一起,防范执政风险的主要任务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国内外敌人的进攻,风险严峻,但任务明确,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很高,每次危急关头总能转危为安。

二战后,在欧亚诞生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由一国发展为多国,防范执政风险的对象、任务、目标等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了新的变化,执政风险不仅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和破坏,而且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价值认同和利益协调的矛盾和冲突,来自执政党自身内部整合和自身建设不足造成的风险。从东西方冷战时的朝鲜战争、美国干涉古巴的猪湾战争到美国对越南的十年战争,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活动从来没有停止;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到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家底”被不断折腾;从1956年的“波匈事件”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社会资源整合的能力受到挑战,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客观上被提了出来;从1948年的苏南冲突到60年代的中苏论战,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国际环境开始更加恶化。这一切表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开始不稳,危机的种子已经埋下,只不过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大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并对资本主义严加提防,在两制关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还能达成共识;在国内大都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利用历史执政的合法性和“明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赢得人

2 马克思主义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研究

民群众的理解、宽容,使执政风险和危机处在还能容忍的程度。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次改革浪潮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国际环境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打起了“没有硝烟的战争”和“以谈促变”策略,防范外来执政风险由“明枪易躲”到了“暗箭难防”。从国内环境来说,改革开放成为潮流,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是社会主义理论还是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信仰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等开始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和信仰的选择,特别是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逆向”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引发了苏东剧变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

苏东剧变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冲击至今未减,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迎来了执政风险和危机的高发期,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外交风险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防范执政风险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头等的大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建原理为指导,以苏东剧变的教训为借鉴,对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苏东剧变以来二十多年的防范执政风险的战略对策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以求为我党有效防范执政风险提供启示。

一、防范执政风险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执政风险

冷战结束后,随着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执政风险越来越多,已经进入执政“高危期”。那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当前面临哪些执政风险呢?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政治风险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导致的政治风险。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平演变”的攻势愈演愈烈,所谓的“民主”和“人权”是其旗帜,民族和宗教问题

是其突破口,“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是其所谓的目标模式,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以及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其最终目的。二是民主法治缺失和民主推进中的经验不足造成的政治风险。一方面,由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大都产生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影响比较深远,加上长期推行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民主法治建设长期落后,既造成权力高度集中并凌驾于社会和法律之上,又造成民众的极度不满和渴求民主的冲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处理不好就有爆发冲突和危机的可能。另一方面,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是时代的趋势和世界潮流,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不例外,但由于缺乏民主的训练和经验,在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失控,造成政治风险。这方面,苏东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有血的教训。三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不力,某些位高权重的干部腐败引发的政治风险。列宁时代强调党的最主要的危险是官僚主义,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加强对位高权重的干部的教育管理。今天腐败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危险的敌人,腐败既导致广大党员对党的离心力,也导致广大民众对党的不信任。

2. 经济风险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发展“先天性不足”带来的经济风险。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走上社会主义的,底子薄,起点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物质基础非常脆弱,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落后就要挨打”,经济落后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大的“短板”,也是执政地位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因路线、方针、政策失误等“人祸”造成的经济风险。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经济文化水平低,社会主义优越性无法充分发挥出来,本应该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但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大都犯了超越阶段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目前虽然这些国家都进行了经济改革,但对如何改革仍存在着争论和意见不一致,左的错误时不时以新的形式出现,困扰改革进程,消解着改革的已有成果。三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造成的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and 经济发展滞后的危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大都比较落后,资源浪费严重,科技含量低,环境和生态破坏严重,如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不仅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而且不能克服经济发展滞后的危机。四是市场经济机制失灵出现

的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宏观调控不力,市场失灵造成的危机也是经常发生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金融动荡和危机。例如,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波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等国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五是“资强社弱”不平等经济竞争带来的经济风险。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强社弱”是现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较量成为主战场。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取得不少成就,但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资本主义往往利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对社会主义国家挑战施压,在经济贸易中赚取超额利润,并企图从经济上控制社会主义国家。

3. 思想文化风险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思想文化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因苏东剧变冲击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风险。苏东剧变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造成的思想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用?社会主义到底能否战胜资本主义,还有前途没有?等等。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开始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再坚定,而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思想文化渗透带来的思想文化风险。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各国文化和思想开始交融和碰撞,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主导地位 and 优势,千方百计地向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推销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特别是诋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价值追求的先进性、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受到严重冲击。三是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金钱拜物教和价值多元化发展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挑战风险。市场经济发展的利益最大化趋向,使人们开始重视物质利益和需求,重视个人的价值实现,但也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其一,极端的拜金主义盛行,社会道德和责任缺失;其二,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追求向多元化发展,传统的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挑战;其三,自由主义思潮受到某些人的追捧。四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封建主义思想、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够等弊端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服力和吸引力下降的风险。

4. 社会风险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社会矛盾和风险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公平正义贯彻不力导致的社会风险。当代社会主义国

家都先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实施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鼓励有能力的人先富起来。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而改革的其他配套措施又跟不上,结果出现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个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的社会心理越来越不平衡,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着社会稳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威胁。二是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整合能力不够导致的社会风险。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化,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经济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发展成为趋势;其二,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了新的变化,新阶级、阶层迅速发展,原有社会结构和利益群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利益整合和社会认同的难度加大,搞不好就会形成风险,影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安全。三是由执政党干部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不足导致群体性事件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主义国家都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各种建设工程和项目涉及人民群众方方面面的利益,本来要求党的干部做细致的群众工作,协调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但有些领导干部从行政命令的惯性思维出发,简单粗暴,伤害了某些民众的感情和利益,导致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党的执政地位。四是由民族、宗教事件导致的社会风险。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敏感的社会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唆,某些民族分裂主义者不断闹事,容易引发社会风险和危机。五是社会力量的“崛起”和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与政治参与平台不足和渠道不畅的矛盾导致社会管理失控引发的社会风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转型的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公民自治组织等迅猛发展,代表着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政治组织也迅速出现,它们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高涨。如果对这些社会组织和力量不能给予有序的引导,任其自由发展,也容易产生社会风险。

5. 外交风险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外交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一超多极”国际政治格局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外交风险。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政治格局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冷战后这种多极化发展变成了“一超多极”,美国成为政治格局中的

“霸主”，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大都是多极中的“弱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裁、经济封锁、经济遏制等成为家常便饭，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被动挨打”的风险。二是冷战思维下的军事威胁导致的外交风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冷战思维并没有随冷战结束而消除，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国家仍实施军事战略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仍有爆发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朝鲜、古巴和中国，这种风险时刻存在着。三是由美国等外交战略东移和称霸亚太野心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政治活动空间挤压、与美国直接利益博弈产生的外交风险。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有四个在亚洲，大都处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地带，而中国、朝鲜更是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主要障碍，特别是中国又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所以，这种地区竞争带来的外交风险日益增强。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

苏东剧变惊醒“梦中人”，使当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真正意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已经由理论上的“可能”变成现实，是真的“狼来了”。各国党开始由过去的好大喜功和自我感觉良好到强化忧患意识和警钟长鸣。

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要“常怀忧党之心”。邓小平多次告诫：“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①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②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③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等于永远拥有。”^①强调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2012年,党的十八大更是提出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四大考验”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建设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危险”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越南共产党提出,党面临着“四大危机”,“任何一个挑战都不可轻视”。早在1994年,越共七届中期会议就提出越南面临着“四大危机”,即经济发展滞后危机、和平演变危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危机和贪污腐败危机。此后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强调,“四大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更加复杂。2006年,越共十大指出:“我国正面临着很多巨大的挑战,各种问题相互交错、相互作用并发生复杂变化,任何一个挑战都不可轻视。”“这关系到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②近年来,越共提出要继续开展预防和反对“和平演变”、“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的斗争,及时、妥当地应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安全、内部安全、思想安全问题。”^③2011年,越共十一大重申:“我国仍然面临着许多相互交织一起的演变复杂的挑战,仍然隐藏着影响世界地区各国经济的危机。”^④

老挝人民革命党提出,老挝存在着“危险问题”。2001年,老挝党七大指出,20世纪末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内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许多宝贵经验。2007年7月,老挝国家副主席本扬·沃拉芝强调,老挝存在着贪污腐败等“危险问题”。

朝鲜劳动党强调,朝鲜进入了“生死存亡危机期”。朝鲜劳动党认为,苏东剧变使朝鲜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进入了“国内外形势最为复杂和尖锐的时期”,开始了“苦难的行军”,成为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危机期”。金正日曾指出:“在建设强盛大国的过程中,会有许多不足,将遇到许多困难。”^⑤

古巴共产党提出,“必须时刻警惕风险”。200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② 古小松主编:《2007年越南国情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

③ 古小松主编:《越南国情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④ 转引自程林辉《中越两党的忧患意识及其比较》,载《桂海论丛》2012年第1期。

⑤ 转引自张宝仁、王新刚《浅析近来朝鲜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出现的新变化及其走势》,载《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3期。

曾经指出：“当苏联解体时，对我们来说仿佛太阳不再升起，古巴革命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古巴的特殊时期情况好转了，但世界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应该永远作最坏的打算。不能忘记这样一个原则：成功时要谨慎，逆境中要坚定。”^①他强调：“必须时刻警惕风险。”^②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的新趋向

（一）从增强执政党理论和事业吸引力的目的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上，从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化、教条化向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转变，从“喝野菜粥的社会主义”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到追求“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社会主义”。

1.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由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化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和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越共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今天的新情况、新变化“没有留下一句明白的话”^③。越共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诞生 150 多年了，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实践中都找不到的问题。越南共产党创立了胡志明思想。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范文德教授指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那些特征是必需的，然而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表述中，所有那些特征，几乎都是用来描述未来的可能性或者是一种设想。二十多年来，理论研究工作最显著的成就在于：基本上摆

① [古]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的思考》，徐世澄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1、106、312 页。

② [古]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编：《卡斯特罗语录》，宋晓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③ 李慎明主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 页。

脱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主观唯意志主义，并在理论思维方面有新的突破。”^①

老挝人民革命党强调，马列主义是党指导老挝人民各项革命事业的思想基础，要结合新的条件和实际认真研究和发 展马列主义。1991 年，党的五大指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吸取人类智慧的精华，与老挝实际相结合”^②。2001 年，党的七大再次强调，要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建设结合起来，党要 继续加强主动性和创造性。

朝鲜劳动党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历史缺陷”，从而创立了本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体思想”。朝鲜劳动党 2010 年 9 月第三次代表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把“主体思想”作为朝鲜劳动党唯一指导思想 的地位，并将金正日创立的“先军思想”写入了党章，指出：“朝鲜劳动党确立先军政治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在先军的旗帜下领导革命和建设。”^③

古巴共产党主张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本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蒂思想”。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马克思了解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未来社会。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一种活生生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归根结底，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通过实践加以丰富的科学。”^④

2. 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由贫穷的社会主义向富裕的社会主义追求，由照搬斯大林模式到走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从经济建设单兵突进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一起抓。中国共产党从 1978 年以来的三十多年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越共提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发达、更公平，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2011 年，越共十一大提出，要把越南“建

① [越]范文德：《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理论创新》，潘金娥编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② 转引自谭荣邦《走向全面革新的老挝》，载《科学社会主义》2001 年第 1 期。

③ 转引自王木克《全球瞩目的朝鲜党代会》，载《世界知识》2010 年第 20 期。

④ [古]萨洛蒙·苏希·萨尔法蒂编：《卡斯特罗语录》，宋晓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50～151 页。